

實用奇謀大全

上

# 智囊補

張建國主編



智囊補實用奇謀大全 上

明·馮夢龍

原著

張建國主編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357 智囊補實用奇謀大全

精裝一套二冊 定價2200元(不分售)

---

著作者/明·馮夢龍 主編：張建國

出版者/文海學術思想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

總經銷/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李潤海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7樓之3

電話/3754679·3318447

傳真/3619101 郵撥/01436784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513號

---

印製所/國華印製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416巷59弄3號

---

西元一九九七年十月初版

ISBN 957-9364-23-0

---

*Wen Hai Foundation for Culture & Education*

*7F No.49, 1 Sec., Chungking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R.O.C.*

\* 本書承蒙氣象出版社授權，謹此致謝

## 關於馮夢龍和他的《智囊補》 及其在今天的運用

### （代前言）

生活在大廈將傾的明末的馮夢龍，向以通俗文學家著稱於世。他晚年精心蒐集編輯的話本小說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後世合稱《三言》），幾百年來，既受到歷代通俗文學家和小說家普遍的重視和欣賞；同時，又更為中國都市裡的、市井階層和平民百姓廣泛地垂愛和研讀，而成為他們居家必備的消閑讀物。但他晚年“周覽古今成敗得失”而潛心編纂的一部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和實用價值的《智囊補》，長時期以來卻被世人所忽略而不甚了解。分析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馮氏在通俗文學普及方面的巨大成就，而掩蓋了他晚年對於古今政客和智囊出類拔萃的奇謀研究的成績；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恐怕也是與歷代封建統治者推行其愚民政策而有意識地禁錮這本書在世間流傳大有關係。今天的社會是從昨天的社會發展而來，而現在的社會又是一個人與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充滿了競爭和鬥智的社會，因此，現代人認真研究和汲取歷史上那些成功者和失敗者的經驗教訓，使之“謀則通于遠而周于事”（柳宗元語），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不僅是客觀之可能，而且亦是現實所必需。有鑒於此，本着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古為今用”我們適時而慎重地向大家推薦介紹馮氏的這部《智囊補》，

應該說是有其深刻的現實意義了。

—

馮夢龍，字猶龍，又字公魚、子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詞奴、前周柱史，又曾化名顧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緣天館主人、無礙居士等，明末蘇州府長洲里（今屬江蘇省蘇州市）人，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卒於清世祖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

關於他的生平事迹，由於封建社會鄙視小說家的偏見所致，清人所修的明正史裡沒有馮氏的一席之地，同時代的文人似也沒有想到為這位享譽一時的小說家作“年譜”，或“墓誌銘”什麼的，時至今日，我們對他的情況了解甚少。只是由於他曾當過一任壽寧知縣，故在《蘇州府志·人物志》中，有一段關於他的小傳說：馮夢龍“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崇禎時，以貢選壽寧知縣。”此外，在當時人的著述中，還可以找到有關他的隻爪片鱗。

馮夢龍的祖上大約與嘉定世代為宦的侯峒曾家、蘇州的大儒王仁孝家有過往來。他還有一兄一弟，兄名夢桂，是一位小有名氣的畫家；弟名夢熊，是一位頗有才華的文學生，有詩大傳世；至於馮氏本人，從小就受到過嚴格系統的封建傳統文化的教育（參見馮夢龍：《麟經指月·發凡》），友人王挺譽其“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挽馮夢龍》），以及上述所引《蘇州府志》的贊辭，再從他所編纂的《三言》、《情史》、《古今譚概》、《智囊補》等著述中，可見這些並非僅僅是溢美之詞。馮氏兄弟三人當時並稱為“吳下三馮”，據此推知，馮夢龍的家庭不會是當地的一小戶人家，而至少應為一般的士宦家庭才對。

馮夢龍從小就頗有才氣，很為同時代的青年人所推崇和景仰（文從簡在《馮夢龍》中稱其是“早歲才華眾所驚，名場若個不稱兄”）。同當時的年輕人一樣，他也曾苦讀四書五經，應舉趕

考，企圖從這裡走上飛黃騰達、獲取功名的康莊大道，如從他取字“子猶”這一點上來看，就足以顯示出其不同凡響的遠大志向（子，據《廣雅·釋言》注曰：“子，猶也。”猶，據《水經注·江水源》注曰：“猶，獸名，似猴而短足。好游岩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退，乘空若飛。”“子猶”二字似應出於此。陸樹命先生在《〈三言〉序的作者問題》裡說：馮氏取“子猶”為字，如取“猶龍”為字一樣，“是在激勵自己治學，應如龍乘雲，似猶騰空，進退往退，變化莫測。”）。然而，由於他博覽群書，思想激進，又頗為自負，不願受到傳統教育的束縛，因此，屢屢名落孫山，鵬程遠大的理想無法實現與嚴酷無情的現實生活的尖銳矛盾，使得青壯年時代的馮夢龍內心世界極為抑鬱，只得整天地把酒消愁，出入青樓酒館去尋花問柳，故有過一段時間“逍遙艷冶場，遊戲烟花裡”的狎妓生活（王挺：《挽馮夢龍》）。此時，他倒真的熱戀過一個“美容止，善諧謔”叫侯慧卿的名歌妓（馮夢龍：《桂枝兒·注》），兩人在一起卿卿我我地度過了一段快樂美好的時光，但後來，侯氏迫於某方面的壓力，決定從良嫁人，最終與夢龍揮淚惜別。與侯慧卿戀情的失敗，給予馮氏感情上以極大的打擊，他痛不欲生，大病了一場。在悲怨與思念交織的情緒下，他分別寫下了《怨離詩》、《怨離詞》等散曲，抒發了自己那“最是一生淒絕處，鴛鴦冢上欲斷魂”的怨悔戀情（《怨離詩》），不過，最後他還是從失戀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馮夢龍的友人董斯張說：“子猶自失慧卿，道絕青樓之好。”（《怨離詞·評》）此外，這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生活還給予他後來的文學創作以巨大的推動力，他傾以極大的熱忱編纂的兩部民歌集《桂枝兒》和《山歌》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馮夢龍十分強調文學的教育和啓迪功能，在其編纂的以譏諷封建社會裡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誦道好商等為主的《廣笑府》和《笑府》中，他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自己的用意就在於：“一笑而富貴假，而驕吝伎求之路絕；一笑而功名假，而貪妒毀

譽之路絕；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標榜倡狂之路絕。”富貴、功名、道德，這些為封建士大夫們所夢寐以求的東西，竟成了馮夢龍冷嘲熱諷的對象，這充分體現了他嫉惡如仇和玩世不恭的叛逆立場，也映襯出了他那獨具一格的“笑罵成文章，燁然散霞綺”的詼諧個性（王挺：《挽馮夢龍》）。他公開反對自宋元以來一些偽善的道德家們所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傳統理論，在《情史·序言》中，他開宗明義地宣言自己編纂的目的，就是“欲立情教，教誘諸衆生”，讓天下人“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其立意之脫俗、胸襟之坦蕩、語言之大膽，在當時那個虛偽腐敗的明末社會裡，不說是獨一無二，也是屈指可數的了。他的文友榜之煥曾感慨之：“然則譚何容易？不有學不足譚，不有識也不能譚，不有膽也不敢譚，不有牢騷鬱積於中而無路發撼也，亦不欲譚。夫羅古今於掌上，寄春秋於舌端，美可以代與人之譎，而刺亦不速分校之公。此誠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快事也。”（《古今譚概·序》）至於所編纂的《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今古奇觀·序》），其主要的目的還是想通過它們來勸喻世人，警戒世人，喚醒世人。

馮夢龍雖然自恃才高，但屢考屢敗，卻又擺脫不了封建士大夫們名登仕籍、光耀祖宗的羈絆，終於選擇國子監為進身之階，於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他57歲時入國學，成為一名貢生，大約在次年便破例除授丹徒訓導。四年後，又擢升為福建壽寧知縣。又過了四載，一任秩滿，馮氏便離開了壽寧，歸隱蘇州。在任期間，由於他實實在在地為當地老百姓辦了一些好事，所以，《壽寧縣志》將他列入“循吏”（清官能吏）的傳記裡（參見本書第三春“龔太守治盜有方”一文“簡評”）。

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軍攻陷了北京城，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在煤山上，由朱元璋於公元1368年苦心建立起來的朱明王朝，如摧枯拉朽般地一舉被推翻了。此時馮氏這個受到幾十年封建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站在維護舊王朝的立場上

，將這件事視作“天崩地裂”之變，陷入了如喪考妣的“悲痛莫喻”之中。儘管馮夢龍年逾古稀且身體羸弱，已不能親臨邊疆去爲明王朝的中興搏殺奮鬥，但是，“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促使他拿起自己的那特殊的戰鬥武器——筆，來爲明王朝的苟延殘喘而搖旗吶喊。這期間，福王朱由崧等先後被擁戴稱帝，這給馮氏那乾涸的心河裡送去了一股脈脈溫情和暖流，爲此，他先後編纂了《甲申紀事》和《中興偉略》，以爲“恢復大明不朽之基業”貢獻微薄之力（馮夢龍：《中興偉略·小引》）。馮夢龍甚至還不顧自己年高體弱，先後出游吳江、紹興、武陵等地，爲拯救明王朝的危亡而四處奔走，爲抵禦清兵的大舉南侵而奮起抗爭，他多麼希望能“以餘年及睹太平”，即親眼看到明王朝的中興啊（《中興實錄·叙》）！

遺憾的是，馮夢龍所寄予厚望的福王等王及其輔臣，均是一班昏庸無能的窩囊廢，在滅國亡朝的嚴重威脅下，他們不僅不思振作，反而苛斂民財，賣官鬻爵，貪圖享受，荒淫無度，排斥異己，殘害忠良，弄得人心渙散，民怨沸騰。就這兩三個不堪一擊的南明小朝廷，最終還是被引兵南下的清將多鐸一一收拾了。清世祖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具有漢代循良道行和晉士大夫風範的馮夢龍，在他73歲時，懷着滿腔悲慨，與世長辭了。

## 二

馮夢龍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大廈將傾的明王朝覆滅的前夜，作爲一個長期生活在社會中下層的正直知識分子，他憑藉着自己敏銳的直覺不能不感受到了這一點，並且也意識到自己無力補天；但從維護一個已運轉了二三百年的朱明王朝的立場上出發，在看到朝廷內外不可救藥地腐敗下去的同時，他又屢次幻想着會出現大明盛世時的聖君明臣，來運用他們那救國治民的超人膽略和智囊，去調動社會上一切潛在的各方豪傑和抗清力量，挽回明王朝即將滅亡的可怕命運。《智囊補》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



和指導思想下完成的。

《智囊補》原本書名為《智囊》，它是馮夢龍於明熹宗天啓六年（公元1626年）54歲時，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以驚人的速度編纂而成的。據馮夢龍《智囊補·自叙》和《蘇州府志·藝文志》所云：《智囊》初為二十七卷，但迄今為止尚未發現這種版本。是書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極為暢銷，於是，一些朋友便慫恿馮氏再續編一部《智囊》，然而，此時處於風燭殘年的馮夢龍已是手腳遲鈍，頭昏眼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只好將自己“數年以來，聞見所觸，苟鄰於智，未嘗不有諸胸臆”（《智囊補·自叙》），即對原篇目作了若干調整，並在原書的基礎上，補充了一些篇目，在內容上做了部分的修正，對按語也進行了一定的增刪，然後改名為《智囊補》重新付梓，致使全書擴充為40萬字左右。

增補修訂後的《智囊補》，可視為是馮夢龍晚年嘔心瀝血編纂的一部反映古人巧妙運用聰明才智來排憂解難、克敵制勝的處世奇書，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搜羅宏富、篇幅龐大的智謀錦囊。馮氏以“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為編纂宗旨（《智囊補·自叙》），搜集了從先秦至明末三千多年間經史百家、稗官野史，以及民間傳說之中2000餘則以智取勝的事例。所記的人物三教九流、多種多樣，既有帝王將相、守令縣吏、富紳商賈、名儒俠客、僧侶道士，又有農夫雇工、店員小販、走卒僕役、弱婦幼孺、市井百姓，甚至一代奸雄、狡黠訟師、欺詐方士、誘僧雙盜、地方惡棍、狡童豎子。所叙故事，上自治土安邦的經國大略，治軍作戰的用兵之策，決訟斷案的明察睿智；下至治家理財的精明算計，立身處世的生活錦囊，逢凶化吉的機敏權變；甚至於寵宦奸臣的陰謀詭計，損人利己的狡黠小慧，“惟恐失一哲人，漏一慧語”（李漁：《智囊·序》）。所叙謀略智囊，共十部二十八卷，每部前有總叙，每卷前有題詩，於史料輯錄之外附有許多頗有見地的評述和按語，故“其描寫摹神處，能令人擊節

起舞；即平鋪直叙中，總屬血脈筋節，不致有嚼蠟之誚”（馮夢龍：《新列國志·凡例》）。由於馮夢龍的思想深受李卓吾唯物和民主思想的影響，這就使得他的編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儒學禮教觀念的束縛，摒棄了口是心非的偽道德家呆板、迂腐的乏味說教，因而顯示了一種較為難得的“無有懷而不吐”的平易自然、求真務實的創作風格，較能充分適應廣大市民階層讀者的需要。這種將朝廷廟堂治國牧民的智謀錦囊推薦公諸社會最下層的平民百姓的卓越膽識和超人勇氣，既與當時那班標榜“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的封建衛道士們劃清了界限，又為後世一些潛心研究淵源流長的中國智囊的學者們奠定了基礎。

《智囊補》不僅最大限度地囊括了馮氏當時及以前的智囊故事，而且在自叙、總叙、題詩、按語中，注入了編纂者“資治智囊”的政治傾向和“執方療疾”的思想感情，許多真知灼見啓人深思，“令聾者聰，聵者明，夢者覺，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靜，聒者結，腸冰者熱，心炎者冷，柴柵其中者自拔，倔強不降者亦無不意頰而心折焉。”（汪本鈞：《續刻李氏書序》）是我們研究晚年馮夢龍的政治思想傾向的寶貴資料，當然，限於篇幅，本前言不可能就這一問題展開評述，下面僅在簡叙《智囊補》全書時談談自己的點滴心得體會。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智謀錦囊是帝王將相、守令縣吏獨占的“專用品”，平民百姓豈得染指？馮夢龍卻回答說：非也！在《智囊·自叙》裡，他開門見山地宣稱道：“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尸。智用於人，猶水行於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因此，他欲使“下下人有上上人智”（參見本書第一卷“卷檜以官偽書人”一文“按語”），公然宣言要以智啓人，而與幾千年傳統的以禮愚人相對抗。為此，馮氏將古今運用智囊的事例以及自己對智囊的認識，分別歸類出全書的結構如下：

上智部：（1）見大，（2）遠猷，（3）適簡，（4）迎刃；

- 明智部：（5）知幾，（6）億中，（7）剖疑，（8）經務；  
察智部：（9）智情，（10）詰奸；  
膽智部：（11）威克，（12）識斷；  
捷智部：（13）靈變，（14）應卒；  
術智部：（16）委蛇，（17）繆數，（18）權奇；  
語智部：（19）辯才，（20）善言；  
兵智部：（21）不戰，（22）制勝，（23）詭道，（24）武  
案；  
閎智部：（25）賢哲，（26）雄略；  
雜智部：（27）狡黠，（28）小慧。

這種分類，今人觀之，或許有其雜亂無章、不盡合理、大可商榷之處，但它畢竟是沉寂的天空中的一聲炸雷，昏睡的長夜裡的一道閃電，其首功不可沒！

在《上智部》裡，馮氏認為：智囊的最高境界當是“以恰肖其局”。上智者看似“無心而合”，其實“非千慮所臻也”。以此來印證他在《自叙》中所言：“智猶水，然藏於地中之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作者通過“韓琦巧解皇室矛盾”贊嘆了北宋鼎盛時，君臣得以面對，“肺腑所以得罄”的君臣情誼互洽的信任關係，而暗諷了崇禎皇帝剛愎自用、大疑臣下，結果導致了朝政腐敗、國將不國的黑暗現實，故大聲疾呼執政者要“取大”“視遠”，勿貪近利，能在“危巒前厄，洪波後沸”的重重社會危機之中“出其不意，游刃有餘”。類似這樣的政治見解，幾乎散見《智囊補》的各卷之中，但以《上智部》、《明智部》等前幾部最為集中。

在《明智部》裡，馮氏分明是給明末最高的統治者打氣道：“聖無死地，賢無敗局”，倘若能在“獨目迷津，彌天毒霧”的情況下，決疑解難，驅奸任賢，定能迎來“太陽當空”的大明盛世。他十分欣賞戰國時的西門豹巧制妖巫的智囊，稱讚其“偉丈夫”的大將風度；他高度評價了唐代的大理財家劉晏為國理財、

爲民分憂的“循吏”精神，認爲鑒別一個官吏的好壞，關鍵是要看他能否迅速地斬斷“錯節盤根”，這很有點像當今“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

在《察智部》中，馮氏頌揚了“明察並舉”的虞舜，提出“非明不能察，非察不能明”的著名論斷，指出吏治最顯著的標準是：“得情而天下無冤民，詰好而天下無戕民。”他將前代的官吏與現在的官吏作了一個鮮明的對照之後，認爲現在的官吏腐敗主要是制度上的問題：“令出錢納吏，以吏爲市耳，令訪獄便驚獄矣；說官之心猶吏也，民安得不冤！”如此犀利的批評在那個時代似不多見，這對今天我們所倡導的廉政建設也不無裨益。

在《膽識部》裡，作者首先確定了膽識與智謀在客觀世界中的位置：“凡任天下事，皆膽也；其濟，則智也。”其次分析了智謀與膽識之間的因果關係：“智能生膽，膽不能生智。”他稱讚了況鍾勇於爲部下攬過的自我貶抑的佳行，揭示了明末爲吏者的自私：“即自己之罪尚欲推之下人，況肯代人受過乎？”他批評諸葛亮在用魏延這個人才方面膽識太小，“未免慮之太深，防之太過，持之太嚴”，如聯想到當時崇禎皇帝這方面的問題來看，當是有的放矢。

在《術智部》裡，馮氏生動地闡述了策略（術）與智謀之間的辯證關係：“智者，術所以生也；術者，智所以轉也。不智而言術，如傀儡百變，徒資嘻笑，而無益於事；無術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執轡如組，運楫如風，原隰關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腸太行，危難駭浪，輒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顛且覆者幾希矣。”他號召人們學習動物的“以屈求伸、以伏待飛、以退爲進”術，並設身處地地爲同時代的忠臣周忱委屈求全而正名伸冤，替唐順之等人逆中求順但不爲時人所理解而扼腕痛惜。馮氏在肯定孔夫子“大信不信”的觀點的同時，嘲諷了那些庸儒的“溫雲立殺”。即便是對千夫所指的奸相秦檜，他也能不因人而廢智地肯定其“亦盡有應變之才”。

在《捷智部》裡，馮夢龍強調了把握時機的重要性，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認為有時“一日百戰”，但其“成敗如絲”；縱然“三年造車”，或許“覆於臨時”。因此，一個出色的執政者要在“如火如荼”的事變中，具有敏銳的判斷力和靈活的反應力。

在《語智部》裡，他精闢地闡明了“語智”的重大作用：“談言微中，足以解紛”；“故一言而或重於九鼎，單說而或強於十萬師，片紙書而或賢於十部從事。”他十分贊同張嘉言平息兵變的說服技巧，無不欣賞晏子諷諫齊君的諫君策略，這從一個側面道出他渴望這類賢臣良吏出來輔君救世的迫切心聲。

兵不厭詐，智謀在軍事上的靈活運用是不言而喻的，兩軍相爭，常見的更多的是以智取勝。故在《兵智部》裡，馮夢龍以大量的篇幅敘述了軍事智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批評了那些自詡清高的“言兵惡詐”的腐儒書生，並以歷史上那些以智取勝的聖君賢臣和以愚道敗的昏君蠢臣為例，總結道：“愚遇智，智勝；智遇尤智，尤智勝。故或不戰而勝，或百戰百勝，或正勝，或譎勝，或出新意而勝，或仿古兵法而勝”，或以勢而勝。總之，“智如活水，豈可拘一轍乎！”

人類社會是由男、女兩性所組成的，故“婦女能頂半邊天”。馮夢龍所設置的《閨智部》可見其獨具匠心，他滿懷激情地謳歌了傳說中那些賢惠聰明、智勇雙全的傑出女性，駁斥了封建社會那種“女子無才便是德”歧視女性的陳腐觀念，馮氏進步的婦女觀在這裡大放異彩。

馮夢龍在《智囊·自叙》中曾批駁當時一些正統文人對於他網羅“神奸巨猾”“鷄鳴狗盜”的詐術頗有微詞，他義正辭嚴地反問道：“雖奸猾盜賊，誰非吾藥籠中硝、戟？吾一以為蛛網，而推之可漁；一以為推闡，而蠶之可室。譬之谷王，眾水同歸，豈其擇流而受！”故在書末專門列了《雜智部》，意欲使正人君子 and 善良人們“破其狡”“識其小”。處在“機械變詐之心，每

隨文明之程度而俱進”的現代社會裡的人們，今觀所惜，或許還嫌此一部份內容太少！

由於馮氏所處的時代及其世界觀的局限，因此，如同作者其他的作品一樣，他用來啓迪人們的，並不完全是進步的思想，而其中的封建性糟粕也在所難免，譬如，書中對於農民起義的仇視心理，對於少數民族的鄙視態度，對於社會下層人士的正當反抗的極不容忍，對於王安石變法的錯誤評價，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宣揚了封建道德、封建迷信、因果報應等，這都是今天的讀者在閱讀借鑒時應當仔細甄別辨析的。

### 三

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善於謀略，長於思辨，理性大於感性的智慧民族，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時代，就湧現出了以呂尚、孫武子、張儀等為代表的一大批謀略家、軍事家、縱橫家。周初的姜太公，被公認為是中國謀略學的開山鼻祖，周武王伐紂得以成功，多出自他的深謀算計，故司馬遷稱其“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史記·齊太公世家》）；孫武子作為一代大軍事家，其不朽著作《孫子兵法》被歷代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視為東方的《聖經》，而加以潛心地揣摩與演繹；至於蘇秦、張儀等師承鬼谷子的“飛箝抵巇之術”、“捭闔張翕之資”、“察人心之理，明變化之關”、“以內符應外摩”（參見本書後附錄的張明弼與沈幾的《智囊·序》），憑藉他們那三寸不爛之舌，時而說動東方六國合縱抵禦暴秦的大舉東進，時而挑撥東方六國連橫秦國而自取滅亡，從而改變了那個時代的歷史進程，也為後世的縱橫家、政治家傾慕不已，奉為神明；“秦漢以後歷經魏、晉而南北朝歷史人物，慧黠者口說春秋大義而陽用《左傳》、《國策》之權謀者，代不乏人，尤其以魏蜀局勢，最為顯著。於是初唐之際，而有趙蕤著《長短經》之作，評議古今，昭示正反之旨，其於三國權謀，尤所議論”；“順沿而至明末，則有

李卓吾輩之崛起，攻訐歷史，揭櫫用經用權之談，騷然於學術之林；一變再變，復有馮夢龍等《古今譚概》、《智囊補》等之作，……言賅意長，借詞比事，往往深含夫人微言大義之旨，以示權謀韜略之可用與不可用，以彰善惡之分齊，必須慎思明辨，才參得其圍中”（南懷瑾：《三國演義的政治與謀略·前介》）；及至近代為世人所挖掘出來的《三十六計》等智謀、兵謀奇書，不僅受到倍感謀略之重要的國人廣泛的研讀和詮釋，而且也引起了東方及至整個世界各方面人士的極大的興趣和關注。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當今冷戰較為寬鬆的和平時代裡，各敵對國更多的是進行情報戰、經濟戰、科技戰、外交戰等，換句話說，也就是以智取勝。所以，日、美等國的一些企業家、軍事家、科學家、外交家等，都如同是發現了一座吾國國人們所視若無睹的富礦似地，挖掘翻譯整理中國古老的謀略學的著作，掀起了一股競相研究中國謀略學的熱潮，以便期望從中尋找到克敵制勝的強大武器——智謀錦囊，究其動因，這當然是與他們汲取各自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有關。如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之一，在國際上沒有什麼地位，加之在地域上像是一個浮在大海上的“孤島”，又沒有多少可資藉用的能源，但大和民族國民很有點如同孫武子所說“背水一戰”的膽識與氣魄，日本企業家還將《孫子兵法》應用於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結果，全國上下齊心協力，不過幾十年，日本就再次成為世界上不容忽視的一個強大富裕的國家。再如，美國一向有“國際憲兵”之“稱譽”，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初，美國官方主戰派根本無視中國的警告，斷言中國不敢出兵，而美國著名的“智庫”德林公司的研究結論卻恰好相及：“中國將要出兵！”該公司欲以50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政府，卻遭到了拒絕，那後果便是：美國在朝鮮戰爭中，遭到重大的損失。戰爭結束後，後悔不迭的美國政府便以280萬美元的高昂價格買下了這個早已過時的研究成果。又如，據說美伊海灣戰爭期間，美國沒有小瞧伊拉克這個中東的石油大國，要求參戰的將士熟

讀《孫子兵法》，並在正式攻擊之前——如同《孫子兵法》所說的：“兵不厭詐”——展開了一系列的外交戰、情報戰、心理戰、間諜戰等，給世人的印象是，自己是個“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幾欲“不戰”而使伊拉克國民俯首稱臣的了，戰局的結果當如美國“廟堂”所算。近年來，日本許多大公司、大企業都規定下屬管理人員必須學習《孫子兵法》、《三國演義》，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商業管理學院還要求學生們必須熟背《孫子兵法》中的某些章節。這對於有志於屹立在世界之林的中國人來說，不啻是一個難以避免的“核衝擊波”。世界即將跨入嶄新的21世紀，大國、強國尚且有如此“落後者要挨打”之憂患，而作為一個具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奮起直追中華民族豈能等閑視之？吾國亟需一大批富有遠克卓識、深懷智謀錦囊的“風流人物”！吾國亟需更多更好的整理古代謀略卓有成效的出版物！以此來喚起“東方睡獅”的國民的智慧才幹，愛我中華，壯我中華；以此在當代世界的競技場上施展拳腳，縱橫馳騁。

自從《鬼谷子實用智謀大全》出版以後，承蒙讀者諸君的厚愛，多次再版。在氣象出版社的領導和責任編輯陳雲峰先生等大力支持和具體指導下，我們今不吝淺陋，特地組織了一批學有所成的專家學者，精心地譯注，並附以詳盡的評解，隆重地推出這部集中國古人的高超智謀錦囊和當代學者獨到克識於一體的曠世奇書——《智囊補實用奇謀大全》，以期對於現在正從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司法、教育、科研、生產等各項工作的讀者提供一部實用的智謀錦囊，尤其是對於今天剛剛離開校門、踏上社會的莘莘學子謀職擇業、為人處世提供一部可資參考的謀略寶典。最後還要感謝臺灣文海學術思想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和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潤海先生，將它推薦介紹給大陸以外的中



文讀者。編者再次誠懇地期待着讀者以及各方面人士的不吝賜教。  
。（賜信可由出版社代轉）。

張建國

公元1997年1月17日

於喻家山下